

红色精神永流传

重温经典之五

有一段岁月，波澜壮阔，艰苦卓绝；有一种精神，历经风雨，感动古今；有一份信仰，穿越历史，辉映未来。重温红色经典，让我们穿越时空，在字里行间、声光电影中与先辈们相遇，回顾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光辉奋斗史，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，秉承初心，踏上新的征程。



老电影中的转盘机关枪

□ 赖晨

在老电影《上甘岭》中有这样一个镜头：苏式转盘机关枪被架在坑道口，机枪手排着队，轮流上阵，前仆后继，一个倒下了，下一个接着上去开枪杀敌。在坑道内，伤员们在为机枪手准备弹药，因受伤双目失明的指导员，抱着一个弹鼓（弹盘，也叫转盘子），一颗一颗地填充着子弹，以便让机枪持续不断地喷射子弹。最终，志愿军用苏式转盘机关枪打退了敌人疯狂的进攻。脍炙人口的《我的祖国》就是志愿军伤员在填充子弹时歌唱的。

同样，在老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，志愿军英雄王成端起苏式转盘机关枪向敌人猛烈喷射子弹，横扫敌军如卷席，那种有敌无我的英雄气概，那种“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”的视死如归的精神，令人热血沸腾、荡气回肠！

该机枪全名是“捷格加廖夫DP轻机枪”，1923年，著名的枪械设计师瓦西里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捷格加

廖夫根据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要求，开始设计轻机枪。1927年12月21日，该枪通过了零下30摄氏度的寒冷试验，后被列为苏联红军的制式装备，正式取名为“捷格加廖夫步兵用机枪”。

该机枪最大的特点是枪身上方有一个大圆盘，用来提供子弹，这个圆盘叫作弹鼓，可以装47发子弹，所以志愿军战士也叫它为“转盘子机关枪”。

虽然该机枪在战场上表现优异，但是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枪管发热之后，射击精确度有所下降。所以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有些志愿军战士发现枪管发热了，就用冷水浸泡过的毛巾或衣物给它降温。

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志愿军和美军的武器装备在质量和数量上相差甚远。大部分志愿军手中只有老套筒、三八大盖、七九步枪、762步机枪，打一发子弹拉一下枪栓。轻武器中，苏式转盘机关枪算是比较先进的，深受志愿军的青睐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期，该机枪广泛装备给志愿军的步兵班，在山地坑道攻防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一卷卷抗战家书，在和风暖阳下捧来重读，我心如大海，再卷狂涛。那如金的文字，撕裂长空，卷走了岁月的硝烟，将抗日英烈的家国情怀刻为永恒。

左权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、八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。1942年5月22日，左权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，这封家书写完3天后，在掩护八路军突围日军的扫荡中，左权被弹片击中，壮烈牺牲，年仅37岁。从这封家书中，可见部队生活的艰苦和左权的铁骨柔情。“此间一切正常，惟生活较前艰难多了，部队如不生产，简直不能维持。我种了四五千棵洋姜，还有二十棵西红柿，长得还不坏。想来太北（左权之子）长得更高了，懂得事情更多了，可惜三人分在三处。假如在一块的话，真是痛快极了。志兰，亲爱的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分离二十一个月了，何时相见，念、念、念！”左权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将领，烽火岁月中，他写了一封封朴素而深情的家书，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亲人的牵挂，体现了抗战将领的铁骨柔情。

“宁儿，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，实在是遗憾的事情。母亲因为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，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。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，希望你，宁儿啊，赶快成人，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。我最亲爱的儿子啊，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。”这是1936年8月2日，时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的赵一曼，在牺牲前一刻留下的话。这封记录在日军审讯档案里的家书，抗战胜利后才被发现。1957年赵一曼真实身份才被解开。时隔二十一年后，这封家书才传到赵一曼儿子宁儿那里，宁儿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。

“十几天以来，我们过的是昼伏夜出的生活，恢复了路西时代的游击战了，白天隐藏封锁消息，夜间行动，跋山涉水，淮河已经往来渡了三次，我们主观力量不能与敌人对比，不能不采取游击战术，这一次在战略上是胜利的，打破了敌人包围合击聚歼的计划，主力部队没有受到损失，而且在敌后尽力扰袭，使敌人顾前而不能顾后，疲于奔命。”这是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，在三十三天反扫荡中

写给妻子林颖的家书。不幸的是，1944年9月，在前沿指挥作战的彭雪枫被一颗流弹击中，壮烈牺牲。三个月后，林颖生下了她和彭雪枫唯一的儿子彭小枫。

符克，1915年出生于海南文昌，中学毕业后，投奔在越南谋生的父亲。1939年，日军侵占琼崖，即今天的海南。消息传到越南，已是共产党员的符克立即组织爱国华侨，回国参加抗战，符克牺牲时年仅25岁。看看他的家书吧，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抗日华侨的爱国情怀。“爸和哥！你们宠爱和抚育我，我时刻是牵挂着的。不过，我实在没有机会与能力来报答你

们。也许你们会反骂我不情不孝吧。我之所以参加救国工作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，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的事业而已。”“爸和哥，别挂心吧！鬼子赶出中国以后，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叙天伦之乐！假使遇有不幸，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，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休息了。”

硝烟的嘶吼中，无数英烈未惜头颅，血沃中华。他们热爱亲人，热爱家乡，更爱祖国的河山。英烈的一封封家书字字灼人，乃民族瑰宝与国之魂。

抗战家书撼心灵

□ 卜庆萍



感悟一种精神

□ 甄建萍

爱人是军人，喜欢看抗战片。连日来，追着抗日神剧《李三枪》观看，我也随着他，一起收看。

电视剧《李三枪》的剧情并不复杂，演绎了武泽县长李三枪和妻子王巧姑，联合地下党宋班主、魏大礼等人，勇敢机智地一次次击败小鬼子和汉奸阴谋占领武泽县城的诡计，在战争的洗礼下，李三枪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，带领武泽县人民，保卫县城，抗击日寇的故事。

电视剧演到了三十七集末，有个片段让我潸然泪下——刚刚在战壕里成亲的，李三枪的小舅子王铁锤，与刚当上新娘的桃香，和鬼子拼刺刀，身受重伤，动弹不得，两人拉响了手榴弹，与鬼子同归于尽。那一刻被鬼子的大炮轰塌的战壕，配以悲伤低沉的曲子，悲怆而感人，我被一种大无畏的精神、为信仰而战的精神感染。

小时候，我是捧着红色故事连环画长大的，我读的第一本连环画是《刘胡兰》。我依然记得连环画里刘胡兰的样子。十五岁的她，齐耳短发，绑着红头绳，圆圆的脸上洋溢着刚强。她勇敢地站在反动派面前，问：“我咋个死法？”然后，主动走向铡刀。那时，刘胡兰的英勇故事，让我哭了好久，那句“怕死不当共产党员”，我记忆犹新。

那时，我只有六七岁，我问父亲：“刘胡兰不怕疼吗？她不怕死吗？”父亲说：“怕，她更怕在反动派的压迫下，人民过不上好日子。”那时我还小，不懂父亲话的意思，只是觉得刘胡

兰很勇敢，我默默地下定决心，以后要勇敢。

父亲从此有意让我多读些抗战故事连环画，第二本是《闪闪的红星》。看到胡汉三把潘冬子吊起来拷打时，我指着胡汉三对父亲说：“这个人真坏，他是坏人，我恨这个人。”父亲微笑着，摸摸我的头。

上小学时，我学会了《闪闪的红星》主题曲《红星歌》，我至今记得歌词：红星闪闪放光彩，红星灿灿暖胸怀，红星是咱工农的心，党的光辉照万代……跟着毛主席跟着党，闪闪的星星传万代……

后来，父亲不断地给我买抗日题材的连环画：《小兵张嘎》《平原枪声》《红灯记》《鸡毛信》……每一本连环画，都在书写国人抗击日寇的故事；每一个故事里，都有一个机敏睿智的英雄人物。

上中学时，连环画退出了我的生活，父亲给我买来的是厚厚的书籍：《苦菜花》、《烈火中永生》……我的心境发生了变化，那时，不光是恨鬼子的恶行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感染，勿忘国耻的精神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连环画册，已经隐身在流金岁月里，如今想看哪部电影、电视剧或书籍，手机上就可以轻松搜索，再也不用捧着油墨味十足的连环画册了。

时代投影在一片淀水中

□ 毛本栋

《琴和箫》是一册三十二开的薄薄的小书，是我从旧书店里淘回的。通读《琴和箫》中的作品，眼前呈现出一幅孙犁与白洋淀这方热土密切相关的创作地图。

1936年暑假后，孙犁从北平辗转来到白洋淀。从1936年到1937年，孙犁在白洋淀安新县同口镇教书，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劳动生活。

白洋淀地区的抗日斗争从此成了孙犁最重要的创作源泉。在他的作品里，出现了“荷花淀”这个淀名和名叫水生的游击队员。水生的妻子叫菱姑，他们从小就认识，青梅竹马。水生英勇战斗，壮烈牺牲，菱姑拿起水生的枪，手不颤心不跳，“一股热血冲上她的脸/热情烧蓝她的瞳孔/水生的力量变成了她的力量/扳动枪机就握住了活的水生”。孙犁的内心是崇尚英雄主义的，水生是孙犁笔下诞生的第一个白洋淀地区抗日青年形象。

1942年8月25日，孙犁在阜平写出小说《琴和箫》，初载于1943年4月10日《晋察冀日报》文艺副刊《鼓》上，原名《爹娘留下的琴和箫》，这是孙犁早期创作的重要作品，被作家徐怀中誉为“天籁乐章”，认为它是孙犁抗日战争短篇小说中“特别有韵味和耐人品味的篇章”。

1945年，身在延安的孙犁写了一篇题为《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》的散文，后来以“解放区生活报道”为副题，发表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上，一些场景和《琴和箫》很相近。同年，孙犁在延安又写出了众所周知的小说《荷花淀》和《芦花荡》，都以“白洋淀纪事”为副题。

从《琴和箫》到《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》再到《芦花荡》，孙犁作品叙事基调由沉郁哀伤转为清新欢快，表现抗日战争时期，冀中人民为保家卫国，顽强乐观的革命精神，从直面战争的残酷到对战争中人事、风物的诗意构想，逐渐形成诙谐欢快、清新诗意的“白洋淀派”作品风格，为中国抗战史和文学史增添了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。

在这些关于白洋淀的作品中，孙犁投注了真挚而深切的情感。后来在谈到《荷花淀》的创作时，孙犁满怀深情地说：“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，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，所有送走自己儿子、丈夫的人们的感情。我表现的感动是发自内心的，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，就会受到感动。”诚如所言，孙犁有关白洋淀的作品，几乎都和那里的抗战生活有关。孙犁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。

毛泽东诗词里的雪

□ 成健

1945年8月28日，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，其间，他将自己的一首《沁园春·雪》赠给诗人柳亚子。其上阙饱蘸笔墨描绘了白雪茫茫的北国风光，万里山河在红日照耀下无比壮丽。下阙则站在历史的高度，评点千古帝王——尽管他们创下了显赫的战功与霸业，却都缺乏诗人的文采情怀——由此抒发了超越前人的远大抱负。柳亚子一读之下惊叹不已，推为“千古绝唱”，这首词后来在报纸上发表，迅速轰动山城并传遍全国。

其实，《沁园春·雪》并非写于那时的重庆。1936年2月，毛泽东率领红军准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，行进至陕晋峡谷袁家沟，大雪纷飞中，他登原眺望，视通万里，思接千载，“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，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”没有灵感闪现不可能点燃如此澎湃的激情，没有深切体验不可能达到如此广阔境界。

毛泽东一生所作百余首诗词中，写雪的篇章可不少。雪是天寒地冻的标志，是艰难困苦的象征，而愈是身处逆境，愈能激发起他战天斗地、攻坚克难的勇气，激发起他评古论今、述志抒怀的豪情。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，在毛泽东诗词里形成了强大的张力和磅礴的气势，让读者备受震撼。

如果说这首词里的雪以辽阔的天空为背景，充满着狂飞乱舞的动感，那么1935年10月创作的《七律·长征》则以连绵的群山为衬托，描绘了天晴雪霁后的静态。在历数一路征服的五岭、乌蒙、金沙江、大渡河等天

险绝境后，作者笔锋一转，突如拨云见日，一句“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”，将内心的喜悦投射到皑皑雪山上，也将胜利的曙光展现在人们面前。

登临岷山之颠，毛泽东意犹未尽，遥望巍巍昆仑，天高地迥也仿佛不过咫尺之间。他壮怀激烈，思绪飞扬，又写下气度非凡的《念奴娇·昆仑》。“飞起玉龙三百万，搅得周天寒彻”。“飞起玉龙三百万，搅得周天寒彻”，面对这崇山峻岭、疾风暴雨，毛泽东不禁发出“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”的追问，而且审时度势，纵观天下，显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，“太平世界，环球同此凉热”，这是他对构建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宏大愿景。

1961年冬，毛泽东写了一首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，这是他读了陆游咏梅词，“反其意而用之”。有比较就有辨别，前人在“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”时流露出悲凉情绪；后者却在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中凸现出不屈气概；相对于陆游词中所表达的孤高自许却郁闷失意而言，毛泽东心里则充满“飞雪迎春到”和“她在丛中笑”的乐观自信。

毛泽东写雪的词着眼于雪，寄情于雪，寓意于雪；雪在他笔下的字里行间充实、贯通、凝聚、升华。在跟别人谈诗词创作的体会时，他曾特别强调了一点：真诚。姿态万千、气势恢宏的雪在他心目中就是这样，从来都无须刻意雕饰。这些雪既是身临其境的实景，又分别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品格、历史内涵与政治特质，它们所构成的审美空间，真切地表现出一个伟大领袖在特定时代的心路历程。